

乡村振兴视野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与适应性研究

杨文光¹, 陈伟², 朱俊峰^{2*}

(1. 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乌鲁木齐 830052; 2.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在农业农村发展领域提出了新思想、新目标、新要求,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本研究以新时代为背景,剖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角色与任务,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进行比较与适用性分析,发现当前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适用性分析;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877(2020)04-0124-05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and Adaptabi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YANG Wenguang¹, CHEN Wei², ZHU Junfe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2;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uts forward new ideas, new goals and new requirements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general grasp of the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work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new era,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ole and task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found out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and put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 Applicability analysi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全面且较为系统,其中,“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1]。实现产业兴旺,既要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又要大力培育和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2]。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的阶段性产物,是从农业生产单项服务向产业链的延伸,多元化社会主体的参与有利于形成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格局与能力格局,并有效推进农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深化农业农村产业结构改革,为

农业农村经济增长增添新活力^[3]。

1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

1.1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是农业“产业兴旺”的基础

产业兴旺在于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农机服务业、植保服务业、节水灌溉服务业、农产品储藏服务业、农资供应服务业等。当前农业仍属于弱势产业,其自身的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资金规模、土地规模、劳动力数量、科技水平等,已经到了发展的瓶颈,制约农业本身的发展^[4]。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有效降低农户经营成本并缓解农村劳动力季节性紧张的问题,为提升农业产品质量以及标准化体系建设提供新思路。

收稿日期:2018-11-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8YJA790122);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LJB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3262);粮食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201513004-2)

作者简介:杨文光(1994-),男,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

通讯作者:朱俊峰,男,博士,教授,E-mail: zhujunf501@sina.com

1.2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升级转型是发展“新业态”的关键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发展农业与农村新业态的关键,农业产业发展新业态的方式包括横向延伸与纵向延伸。单从任何一方面延伸都会受到约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不仅要专注于农业产业链的延伸,还要注重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的发展,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服务,并最终形成农业产业化联合体^[5]。公益性服务仅能依靠基层农技组织完成基础性科普、技术宣传指导以及示范项目实施等任务,其服务能力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服务范围与层次有限^[6]。通过政府政策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业社会化有利于新业态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的实施,可以有效增加农业领域新业态的产生,如无人机植保服务产业与节水灌溉服务产业等。

1.3 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促进农村产业融合的重要举措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拓展农业产业,促进农业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可以直接完成或协助完成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等各个作业环节的社会化服务^[7],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也直接或间接地将农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相互衔接,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以及经营体系。围绕农业生产经营,进行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服务,通过订单生产与合作协议等方式,强化一二三产业有机结合,促进农业产业化^[8]。

2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发展模式比较与适用性分析

2.1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发展模式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将普通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构建以家庭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途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根据服务的供给方式可分为农民合作组织互助性服务、农技推广机构的公益性服务以及市场经济组织经营性服务等发展模式^[9]。

(1)农民合作组织互助性服务发展模式

农民合作组织互助性服务是指农户自发自愿成立互助性经济组织为自身提供生产服务的发展模式。农民合作组织是农村数量最多、农民参与程度最高、本土根源最深的组织形式。2017年农

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达到193.3万家,入社农户超过1亿户,平均每村成立合作社3家,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数量的46.8%,2016年超过50%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产销一体化服务,服务产值11 044亿元,其中共同出资、共创品牌、利益共享方式组建联合社7 200多家。农民合作组织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农民合作组织在向农户提供生产服务的同时,也接受外界的农资、农机、农技、融资、信息、销售等社会化服务,农民合作组织互助性服务是农村重要的服务模式。

(2)农技推广机构公益性服务发展模式

农技推广机构公益性服务模式分为直接服务与间接服务。直接服务指通过农业推广体系省、地、县、乡四级机构直接向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等作业环节的技术指导,目前机构数量为41 757个,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区域站)30 226个,占72.4%;编制内农技人员251 644人,相对服务农户数量人力明显不足。间接服务指改变传统服务供给机制与实现方式,采用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方式,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化农业服务组织与服务型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龙头企业等具有一定服务能力,并可以提供有效稳定服务的主体针对农业主要生产环节为农户提供生产服务,并改善服务的供给结构与质量。

(3)市场经济组织经营性服务发展模式

市场经济组织经营性服务是涉农经济组织或部门根据农户需求,满足农户生产经营需要,承接从农业中分化出的部分或全部生产环节,由农户向其支付一定费用,通过合同或服务协议明确双方责任与义务的服务模式。当前存在的经营性服务组织主要包括专业服务公司、病虫害检测与防治机构等,2016年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为1 131个,对农业生产节本增效具有重要作用。市场经济组织开展经营性服务的特点是服务形式多样、服务水平较高,自主发展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强,能够较大程度地满足当地农业生产经营的市场化服务需求,但也存在服务环节较为集中,受经济因素影响明显,难以实现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服务问题。

2.2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比较

农业生产性服务根据需求导向不同发展成不同的模式,不同发展模式具有不同的发展目标、服务性质、服务主体、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及适用范围。从服务发展目标来看,农民合作组织互助性服务发展目标是满足社员互助生产需求,农技

推广机构公益性服务发展目标是满足社会农业科技服务需求,市场经济组织经营性服务发展目标是满足市场的普遍性与差异化农业生产服务需求;从服务性质来看,提供的服务分别为互助性服务、公益性服务、经营性服务;从服务主体来看,农民合作组织包括农业专业合作社、林业专业合作社、养殖专业合作社等,农技推广机构包括全国农业技术服务推广中心、农业技术服务推广站等,市场经济组织包括专业服务公司、经营性的病虫害监测与防治机构等;从服务对象来看,农民合作组织互助性服务服务对象为具有“社员”身份的农户,农技推广机构服务对象为普通农户及涉农经营主体,是面向社会的科技服务,市场经济组织服务对象是具有购买意愿与购买能力的涉农经营主体;从服务内容来看,农民合作组织提供的是全过程的生产互助服务,农技推广机构主要提供技术示范、技术培训以及技术咨询等服务,市场经济组织主要提供良种服务、植保服务、农机服务、灌溉服务等;从适用范围来看,农民合作组织互助服务主要适用于家庭经营的小农户,农技推广机构公益性服务适用于任何农业经营形式,市场经济组织经营性服务适用于服务外包需求强烈的农业生产作业环节。

2.3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适用性分析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适用性判定的根本性原则是提供的农业生产服务是否能够满足农业经营主体的现实需要,可以从农业生产服务的需求与供给两方面进行研究。

从需求角度来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包括共同需求与差异化需求,需要根据服务需求特点研究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模式的适用性。共同需求是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的的服务需求,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农资供应服务、农业科技服务、市场信息服务等。农业经营主体存在共同需求的部分弹性较小且规模较大,因此以农技推广机构公益性服务为主导,农民合作组织互助性服务与市场经济组织经营性服务协同满足农业经营主体的共同需求。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层次化、差异化的特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生产规模的不同,需要提供不同层次与内容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满足农户与其他经营主体需求^[10]。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化需求包括共同需求基础上存在的服务层次、数量、质量方面的差异化需求,也包括因农业生产方式发生转变产生的新的服务需求。农业经营主

体的差异化需求内容包括专业化的大型农业机械服务、智能化灌溉服务、全程植保服务等,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服务市场前景广阔且具有一定的需求弹性,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因此应当重点发展市场经济组织经营性服务。

从供给角度来看,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方式包括互助供给、政府供给、市场供给3种方式。互助供给即农民合作组织内部成员利用自有资源在相同农业生产环节、不同时段或者不同农业生产环节、不同时段相互提供农业生产服务,以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的方式。互助供给的优点是优化合作社内部成员的资源配置,节约农业生产经营成本的同时满足了社员农户的农业生产服务需求,缺点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成员的资源禀赋短缺,提供的服务内容与规模有限,亟需解决农民合作组织融资问题并提升农民合作组织服务能力。政府供给主要包括农技推广机构公益性服务以及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两种形式。农技推广机构公益性服务供给能力取决于政府农技推广机构的农业技术水平、机构的数量规模以及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情况,政府购买供给则取决于政府财政承受力及补贴政策情况^[11]。市场供给受农业生产服务市场价格机制调节,农户有效需求越多,市场经济组织数量越多,农业生产服务供给能力越强,反之,市场供给能力越弱。因此市场经济组织应当结合农业市场化服务发展水平以及农户的需求水平提供经营性农业生产服务。

3 当前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发展结构性失衡

农技推广机构公益性服务与市场经济组织经营性服务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的主要来源,两者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以不同的方式向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生产作业服务。不同的地理区域、不同农业发展阶段以及不同规模的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生产服务的内容与数量同时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需要根据日益变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生产需求做出调整,但当前农技推广机构公益性服务主要是技术咨询、指导服务,经营性服务往往集中于良种服务、农资服务、金融服务以及农机服务等固定生产领域,田间生产全过程服务较难实现。

3.2 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效益制约农业服务组织发展

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效益决定了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服务成本的经济补偿能力。农业田间生产服务大多属于私人服务,如农机服务、灌溉服务等,需要农户向服务组织支付一定费用,但由于农业本身经济效益低,限制农户的偿付能力,因此经营性服务组织难以通过提供农业生产服务获利,部分服务组织甚至难以弥补成本,导致了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化实施难度大,而依靠政府购买或财政资金补贴远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

3.3 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制约农业生产性服务内容范围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有农业经营户 20 743 万户,其中规模经营农户 398 万户,仅占全部农业经营户数量的 1.92%,说明当前农业经营户仍以小规模农户为主。农户的经营规模是决定农户生产方式的关键性因素,小规模农业经营往往机械化程度低,难以摆脱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生产作业环节难以从农业生产中分化出来,社会性服务组织难以渗入小规模农户的生产环节^[12],农户的经营规模也制约了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内容与范围。

3.4 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尚未形成高效的产业化联合体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的一体化农业经营组织联盟。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处于非衔接状态,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家庭农场各自为阵,均处于农业产业链的前端,产业重合程度高。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未能结合农业产业特点与自身优势进行定位,在区域范围内形成重叠覆盖与局部竞争,形成农业生产资源的浪费。

4 新时期关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4.1 高效调整农业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发展结构

解决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结构失衡问题的关键措施是统筹规划,高效调整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需要将农业公益性服务与市场导向经营性服务有机结合,针对不同层次与内容的服务需求,提供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服务,做到因地制宜与合理配置资源,避免服务内容高度重

合,并探索农业生产全过程服务。结构性短缺的农业生产服务,应当进行有效识别,运用市场手段或采用政府购买形式促进农业生产服务的开展,满足农户的农业生产服务需求。

4.2 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服务成本的经济补偿能力

农业生产服务成本的经济补偿能力是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发展的关键,尤其是市场经济组织。解决农业生产服务经济补偿问题有 3 种方法,第一,及时调整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的市场定位,针对不同的需求选择接受服务对象,根据服务成本的经济补偿能力决定服务范围;第二,农业生产性服务应当具有规模经营的特征,从而降低服务的成本;第三,采用市场购买与政府购买结合形式提升农业生产服务成本的经济补偿能力,增强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可持续发展能力。

4.3 落实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促进农业生产主体规模化经营

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的关键是落实农村土地政策,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政策落实主要包括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与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流转行为两方面,通过土地流转制度建设与过程管理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结合区域自然经济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因素,实现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通过服务组织统一采购生产资料,连片经营,实现农业生产的标准化,发挥农业机械装备作业能力,提升分工分业专业化服务效率,可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作业成本,提高农产品产量与品质,实现农业生产的节本增效,促进农户增收。

4.4 积极培育与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化联合体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培育与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打破“大而全”“小而全”格局,明确农业生产性组织目标与功能定位,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根据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自身特点,发挥农业生产服务优势、分工协作,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协同发展,延伸服务产业链条,并拓展服务领域,丰富服务内容,形成多元互动、功能互补、融合发展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在合作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建立合理有效的契约关系,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结机制,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 [1] 廖彩荣,陈美球.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7,16(6):795-802.
- [2] 姜长云.关于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5):8-15,110.
- [3] 姜长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模式、机制与政策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1(51):2-25.
- [4] 芦千文,姜长云.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启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5):104-115,157.
- [5] 芦千文.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组织创新逻辑与融合机制设计[J].当代经济管理,2017,39(7):38-44.
- [6] 刘楠,张平.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4(8):65-68.
- [7] 杜志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瓶颈约束:豫省例证与政策选择[J].东岳论丛,2013,34(1):144-149.
- [8] 姜长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举证:自安徽观察[J].改革,2011(1):74-82.
- [9] 董欢.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思考[J].农村经济,2013(6):112-115.
- [10] 鲁可荣,周洁.农业生产组织对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意向及实际满足度分析—基于对浙江省178例农业生产组织的抽样调查[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135-139,33.
- [11] 郑文琦.技术外包模式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应用研究[J].吉林农业科学,2008(3):62-65.
- [12] 张平,孙伟仁.我国农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现实问题与优化路径[J].求是学刊,2015,42(2):61-67.

(责任编辑:王丝语)

- (上接第123页)
- [5] 李红波,张小林.乡村性研究综述与展望[J].人文地理,2015,30(1):16-20.
- [6] 贾衍菊,林德荣.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与影响机理—基于地方理论的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7):161-169.
- [7] Cheng T M, Wu H C. How do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affect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An integrated approach for sustainable island tourism[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5, 23(4): 557-576.
- [8] Kil N, Holland S M, Stein T V.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recreation motivations,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s[J].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 Tourism, 2014 (7-8):16-25.
- [9] Lee T H. How recreation involvement, place attachment and conservation commitment affect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1, 19(7): 895-915.
- [10] Ramkissoon H, Smith L D G, Weiler B. Testing the dimensionality of place attachment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place satisfaction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approach[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6: 552-566.
- [11] 窦璐.旅游者感知价值、满意度与环境负责行为[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6,30(1):197-202.
- [12] 余晓婷,吴小根,张玉玲,等.游客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研究—以台湾为例[J].旅游学刊,2015,30(7):49-59.
- [13] 赵黎明,张海波,孙健慧.旅游情境下公众低碳旅游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三亚游客为例[J].资源科学,2015,37(1):201-210.
- [14] Hidle K, Cruickshank J, Nesje L M. Market, commodity, resource, and strength: Logics of Norwegian rurality[J]. Norsk Geografisk Tidsskrift-Norwegian Journal of Geography, 2006, 60(3): 189-198.
- [15] Cloke P, Edwards G. Rur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81: A replication of the 1971 index[J]. Regional Studies the Journal of the Reg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1986, 20(4):289-306.
- [16] 魏鸿雁,陶卓民,潘坤友.基于乡村性感知的乡村旅游地游客忠诚度研究—以南京石塘人家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14(3):108-116.
- [17] 冯淑华,沙润.乡村旅游的乡村性测评模型—以江西婺源为例[J].地理研究,2007,26(3):616-624.
- [18] 张春花,卢魏.中国城市居民乡村旅游动机研究—以上海、南京为例[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8(5):703-706.
- [19] 刘锐,卢松,邓辉.城郊型乡村旅游地游客感知形象与行为意向关系研究—以合肥大圩镇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3):220-230.
- [20] 范钧,邱宏亮,吴雪飞.旅游地意象、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以浙江省旅游度假区为例[J].旅游学刊,2014,29(1):55-66.
- [21] 陈虎,梅青,王颖超,等.历史街区旅游意象对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性研究—以满意度为中介变量[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12):106-116.
- [22] Yoon Y, Uysal M. An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s of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on destination loyalty: a structural model[J]. Tourism Management, 2005, 26(1): 45-56.
- [23] Fornell C,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1):39-50.
- [24] 熊友平.湖州市乡村旅游发展的资源因子及其提升路径研究—基于灰色关联度分析的视角[J].东北农业科学,2018,43(6):53-57.

(责任编辑:王丝语)